

一位上海城派道士的口述史

——顾冠福道长访谈录

龙飞俊采访整理

[整理者按] 顾冠福老道长, 是一位年近 90 岁的上海正一派道士, 也是最后一位仍然在道观中建斋设醮、为道教信众服务的上海“城派”道士。本次访谈于 2010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城隍庙内进行。在不影响读者阅读理解的情况下, 本文基本保持了顾冠福道长口语化的表述特点。

一 我做了 一辈子道士

我叫顾冠福, 1921 年生于上海, 虚岁 90 岁了, 是上海本地人。我 14 岁时就拜先生学做道士。我的先生是沈定荣, 法名叫宏贵。我家里不是祖传的道士家庭, 只有我一个人做道士。我们属于正一派, 在上海城里做道士, 属于上海的“城派”。^① 我的老家在现在徐汇区的东安路零陵路, 我也出生在那里, 这个地方以前属于日晖港港西的范围。我现在已经不住在那边了, 1994 年搬走的。我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个, 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 但小时候夭亡了。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在亲戚里面, 我的堂姑父叫曹焕元, 是一个有名的道士, 我就是由他领进门做道士的。其实最初我并不想做道士, 我的娘舅一直叫我去学唱沪剧。但那个时候唱戏被人看作是不入流的行业, 祖母不同意我学戏, 让我跟堂姑父曹焕元去学做道士。那年我差不多 14 岁了, 结果曹焕元却不肯收我, 原因是曹焕元有三个老婆, 每个老婆的兄弟儿子都要跟着他学道士, 他怕摆不平。我的姑姑是他的第一个老婆, 也是最宠爱的一个, 最后没有办法了, 就叫我去拜沈定荣即沈宏贵为先生。于是我就跟着师父沈宏贵学道。学了一年多以后, 日本人打到上海来了, 我逃到师兄金鸣皋家的庙里避难。金鸣皋家里的庙叫陈泾庙^②, 在高恩路徐家汇路^③附近。我的师父沈宏贵也逃到这个庙里来, 我们吃喝睡都在庙里, 有时也跟着金鸣皋一起做道场。陈泾庙是一个子孙庙, 在金鸣皋父亲金银贵时就已经有了。金鸣皋和我年龄差不多, 年纪小, 所以当时陈泾庙还是他父亲金银贵当家。沦陷的时候, 一些庙就变成了收容所。我的父母和妹妹没有和我一起住在庙里, 另外借房子住。我逃到庙里, 也是因为家里小孩子多, 父母养不起我。我也是凭着师生的交情住到了庙里。那段时间, 庙里都是道士。日本

① 城派, 是道士对上海老一辈本地道士的称呼。相对于城派, 还存在现在已经属于上海市的其它区的道士, 如嘉定派道士、浦东道士, 也存在外帮道士, 如苏帮、无锡帮等等。顾冠福道长所说的城派道士的地域范围, 见后文访谈中他的定义。

② 陈泾庙, 位于今高安路肇嘉浜路东北角。该庙旁原有明嘉靖刑部尚书潘恩之墓, 庙内藏有敕、封、祭、葬等墓碑, 当为墓庵, 后改奉城隍神。参见民国《法华乡志》卷 7《寺观》。

③ 今高安路肇嘉浜路。高恩路, 1914 年法租界公董局越界所筑, 1943 年改名为高安路。徐家汇路, 原为肇嘉浜北岸马路, 始建于 1860 年, 自 1954 年起开始填没肇嘉浜打浦桥至徐家汇段, 1956 年与南岸斜徐路合并更名为肇嘉浜路。参见《徐汇区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85 页、316 页。

人没有打庙,他们好像也很喜欢迷信。^①他们看见老爷^②在里面就不打了。我在庙里住了一年多以后,就返回家里去了。老家属于沦陷区,那时叫东庙桥路^③。回到家后,我有道士做就做道士,没有就种地。我是做赴应的^④,谁叫我去做我就去。有时法华^⑤那边叫我,金鸣皋也叫我。

我在学生意^⑥时,拜了老师,就跟着先生到处去做道场,慢慢就认识了一些人。我们那个时候学做道士要学五年,五年满了以后,就要摆满师酒。先把请柬发出去,特别是发给各个老板,就是班首,意思就是想告诉他们我已经满师了,如果有什么生意可以叫我做。学师要学五年,但也要看老师的,一般要四到五年,有时满师后还要给师父帮一年工,至少要学三年,不过三年学不到什么本事。因为过去要求我们道士做的东西很多,要吹,要敲,要写,还要念,样样都要会。如果要学法师,又要另外下番功夫了。以前学法师,除了肚子里面已经有些东西了能上手了之外,师傅还要肯教你,还有重要的是要下本钱。什么是下本钱呢?我们过去学法师,首先道士的法衣都要由自己准备好。这些法衣不止一件,而是很多件,比如发符一件、表^⑦一件等等。还有朝板、牙筒、格之类的,发符里还有传递^⑧。这些老板都不负责的。而那个时候,买一件法衣对一般人来说很贵。另外,还要交拜师金。我记得是当时是20至40元老法币^⑨。在我印象中,我用过的币种换了不知有多少,从铜板到现在的人民币。我摆满师酒时20岁左右吧。按理说我早一年就满师了,但因为没钱,就存了一年的钱才请的酒。在摆满师酒时,我连着结婚喜宴也一块摆了。前一天是满师酒,后一天是喜酒。结婚以后,我还是做道士,没道场做时也种种地。

过去做道场,如果是清^⑩的,比如说有人生病了就做做发符、解星,毛病重一点的就要加个地司、过关、告斗,有钱一点的人家还要加做一个立狱、翻解。立狱,过去也叫捉鬼,法师口里念:“上张天罗,下张地网……”这场法事就叫立狱。翻解,就象做十殿阎王一样,一般不做,因为一般人家都做不起。做得最多的就是解星、过关之类,地司、告斗已经不得了了。另外,人家造了房子就要收土,收土做的也是发符、斋天、地司。如果是做亡的,没钞票的人就做发符、亡斗、地狱灯,再有钞票点的就做发符、九幽灯、九阳灯。如果这家人时间做得长了,什么法事都做过了,就要做一些清的事情,加做发符、表、度人灯。这些要很多钱,一般人做不起。一些富裕的人家,亡人过了三周年,就要加做这些清的科仪,如发符、斋天之类,表示谢谢天地。而新过世的人,还在“七”里面,就不做供天或斋天。因为家里刚刚死了人,没什么可开心的,所以也不必谢天谢地的。清的,要等周年后,生活太

① 顾道长此处的“迷信”指道教。在访谈中,顾道长对道教的称呼有几种,如迷信、道教、传统文化等,在他叙述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种种称呼,却似乎并不构成他的表述不一致的障碍。这种现象既有趣,也很值得思考。

② 上海本地人习惯把供奉的神灵称为“老爷”。

③ 即今东安路。当时,陈泾庙东西各有一座跨越肇嘉浜的桥梁,东边的称为东庙桥,西边的称为西庙桥,与桥相连接的马路也相应称为东庙桥路和西庙桥路。东庙桥路于1964年改名为东安路,西庙桥路于1918年改名为谨记路,1965年改名为宛平南路。参见《徐汇区地名志》,第266页、第279页。

④ 赴应,与其相对的是班首。赴应和班首都是散居道士。在民间生活当中,班首是道教法事活动的承接人。当班首应信徒要求承接了道场活动时,就会请其他的散居道士共同来完成这些道场科仪。道场中被请的道士和以应招赴班首处做道场为生的道士,被称为赴应道士。道场由班首承接与组织,道场中的道具大部分由班首提供,做道场所获得的报酬大部分也归班首所有。所以,赴应道士也有将班首称为老板的。

⑤ 即法华乡,位于市区西部,东邻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西界蒲淞市,南连漕泾乡,北至吴淞江,因境内法华禅寺而得名,明代中叶形成法华镇。参见《长宁区地名志》,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⑥ 即初学做道士时。

⑦ 指发符、进表科仪。

⑧ 指发符科仪中的传递这一环节,这时法师需要换上另一种法服。

⑨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即法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禁止白银流通。1948年8月19日,法币被新发行的金圆券所替代。但在抗战期间,上海属于沦陷区,1942年5月31日汪伪财政部颁布公告,禁止法币流通,强制推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即中储券。

⑩ 道教中,应信徒要求所做的科仪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清的,即为生者所做,如祈福禳灾的科仪等;一类为亡的,即为亡人所做,如超度亡魂的科仪等。

平了才做。死人时,做发符、亡斗、灯、九幽朝、九幽灯的比较多。

后来我一直做道士,做到解放以后,“文革”时就完全不做了。因为说做道士是迷信,经书道具什么的也都被烧掉了。刚刚解放时,生意没什么影响,到了1956年、1957年就不行了。1958年时,有的人家死了人一定要做,就只好偷偷做。^①放在晚上,也不敢用那么响的乐器。“文革”时完全没有道场可做,我就种地,参加过人民公社,养养猪。再后来,我去上海市木材公司做临时工。做了一年多后,公司要将我转为正式工,但检查身体时说我有肺结核,就没有要我。我只好又回去种地了。

解放前生意最好的时候是抗战胜利后的一两年时间,抗战前的生意也不太好。战后生意好,是因为打仗的时候日本人把老百姓的房子都烧光了,抗战胜利以后老百姓都要造房子。过去老百姓讲迷信,造好了房子以后怕不太平,都要请道士去念念经,都要收告,也叫收土。我们原来在的南市区,肇家浜边上的老百姓抗战胜利后全回去了。回去了以后,老百姓发财了,全都要造房子。就要请道士来收收土。这样东家也要收土,西家也收土,我们的生意就非常好了。这些都是清的。亡的生意还是不好,因为死了人都很苦恼。其实老百姓也没有钱,并不是发了财,而是靠摇会^②来集资的。

至于我自己的家庭情况,我结婚后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就住在前面说的东安路那个地方。结婚才一年多,我大概21岁,老婆就得了肺病,但没钱看病,就病死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我母亲那时还很年轻,她自己也在生孩子。我岳母怕我女儿吃苦,就把小孩领走了,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年,我再次结婚,又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还是住在以前那个地方。除了抗战时逃到陈泾庙躲避了一年多之外,我没有搬过家。我在家一边做道士一边务农。

1983年白云观^③重新开放,我开始去白云观做散居道士。我记得白云观开放的第一天,陈莲笙会长^④叫我去庙里做道场。当时庙里的道士很少,也几乎没有什么道场可做。老会长名义上是叫我去烧炉子的,实际是叫我去做道士。可是我觉得庙里的工资太少,记得只有37块5毛,所以我说我不干。那时庙里道场少,外头也还没有开放,有时晚上偷偷地做,所以我就一直在外面做,生意好时做散居道士一天的收入也有20块到30块钱。同时我也在白云观兼着做,但不是常驻道士,一般是白天在道观里做得多,晚上就在外面做。记得有一次我在宝山吴淞附近做道场,结果被人举报,民警把我和老板都弄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所长问了我们的情况,后来也就让我们回去了。还有一次,大概是90年代初,在文化广场,就是现在的建国路茂名路那块地方^⑤,也叫我们去做道场。文化广场是国家单位,我们做完要走的时候,记者来了。第二天这件事就上了报,说文化广场在搞迷信活动。后来又有人将这件事反映到了上海市道教协会。总之那时还是把道士的活动看作是迷信。

我在白云观做到1995年,一直是外面和庙里兼着做。1996年,我被上海城隍庙^⑥聘请去做法师,成为一名常驻道观的道士^⑦。从1996年到今年5月为止,我在城隍庙做了13年了。当初进城

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期;1957年,反右斗争和大跃进;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正常的宗教运动受到影响。

② 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信用融资行为。旧时,有的家庭因结婚、生病、丧葬、建屋等大事,一时经济困难,借贷无门,则与亲友、邻居商量,邀集摇会。会洋根据困难者需要而定,通常一会十人,先由邀会人备酒菜,请与会者参加,聚宴时付款,邀会人为头会,其余人以摇骰子决定收会名次。亲朋好友一般不付利金,街坊邻居则需付一定的利金。

③ 海上白云观,原址在老西门西林后路100弄8号,2005年迁至小北门大境路239号。1983年11月,上海市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进入白云观办公。1984年6月白云观开始修复工作,同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

④ 陈莲笙(1917-2008),已故著名的上海正一派道士。曾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

⑤ 此处有误,文化广场位于今永嘉路、陕西南路、复兴中路、茂名南路范围内。原址为1928年创办的法商赛狗会,即逸园跑狗场。1952年,改建为文化广场,成为上海市群众性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参见《卢湾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1998年版,740-741页。

⑥ 上海城隍庙,修复后于1996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

⑦ 今天上海常驻宫观的道士,是一个道观常驻的宗教教职人员。与散居道士相比较,在组织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他们有编制和每月固定的收入。

隍庙时,我和吴关德、凌晋明还有另一位老道长,四个人一起,是作为老道长聘请进城隍庙的。我们除了在庙里做道场之外,主要负责教授庙里的小道士。但两年时间不到,有两位老道长相继过世,我的责任就比较重了。我们教的小道士有一些是第二届道学班的^①,他们现在也不是小道士了。记得当时第一届到城隍庙来了两个小道士,第二届来了六个小道士,人数太少,所以做科仪也做不拢^②。我从基本的念经拜忏一直到做法师,通通都教给这些小道士,现在他们都已经能够上手了。

说到做一名道士的感受,我觉得现在做道士,国家政策好^③,待在庙里面,生活有保障,钞票也不少,比过去好得多了,但我的年岁也大了。

二 我所知道的上海“城派”道士

我们上海的道士属于正一派^④。我们在上海城^⑤里,属于上海的“城派”。城派的范围,南到龙华,往西到漕河泾,西北到法华镇,北到闸北,这个范围之内的道士做的道场都一样。城里的道士祖传的不多,都是亲戚朋友当中有做道士的,就寻一个门路去学做道士。城派的道士都互相来往,城派所在的地方都是本地人,本地人是不会请外面的道士做道场的。在上海城,除了我们上海本地的道士,还有嘉定的道士和外地的道士,他们有些人也跑到上海来办道院。什么叫道院呢?其实开办道院就象开一家店一样,他们还要挂上一幅张天师的神像。以前凡是家里有人过世了,要开路、大殓,就到道院里去请道士。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有了不少外面来的人,比如到上海做生意的,这些人有了事情,又不知道道士在什么地方,就会到道院去请道士。上海的道院很多,有宁波道士开的、嘉定道士开的、苏州道士开的、广东道士开的、无锡道士开的,各个地方的都有^⑥。而城派的道士都是上海本地人,念的经一样,做法也一样。本地道士包括城里的和郊区的。现在的徐家汇、龙华等地方,过去都是郊区,当时那里都是种地的农民。我们上海的道士和浦东的道士也不一样。过去我们瞧不起浦东的道士,他们也待在浦东不过来^⑦。不过就浦东这个地方来说,内部又分为很多派,比如浦东的三林塘、钦赐仰殿、洋泾、川沙等地方的道士,虽然都在浦东,但做法都不一样。总的说来我们城派道士和浦东道士是不相往来的。浦东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士叫沈阿义,他跑到上海城

① 1986年,上海市道教协会开办了第一届上海道学班,以课堂教学的方式传授道教科仪和道教知识,学制三年。1993年始,道学班改为道学院。至今为止,上海道教协会通过道学班或道学院的形式,已经培养了四届道教学员。这些培养的学员毕业后被分配进入上海各个道观,成为一名驻观道士。

② 根据道教科仪的规范,有一位法师参与的科仪,至少共需要九位道士来完成。如果超过一名的法师,即更大型的科仪,有时需要十几位道士。

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关闭的道观陆续开放。现在上海正式开放的道观有二十几所。根据规定,宗教活动只允许在正式开放的宗教场所内进行。不过,即便如此,除了驻观的道士之外,散居道士目前在上海浦东、奉贤等区和城郊的地方也很活跃。请见拙文《上海浦东散居道士现状调查》,《宗教教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元大德八年(1304年),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封为“正一教主”,总领三山符篆,符篆各派被统称为正一派。此后,正一派与发源于北方的全真派一直是中国道教的两个主要教派。上海历史上一直以正一派为主,并主要受到龙虎山和茅山道教的影响。相关内容可参见《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 顾道长讲述的“上海城”和城派的“城”,不仅仅是指1553年上海为防倭修筑城墙而形成的上海县城的范围,而是包括上海县城即俗称的老城厢在内,及其周边郊区的一些地方。或者说,顾道长眼中的“上海城”,是1914年上海县城墙拆除以后形成的上海城市。但具体来说,这位老道长眼中的“上海城”范围何在,仍然是模糊的。根据顾道长所说的范围,“南到龙华,往西到漕河泾,西北到法华镇,北到闸北”,似乎又是老上海县浦西部分的范围。关于上海城墙的修建与拆除,参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65-370页。

⑥ 上海解放前的这些私家道院,不供信众烧香,而是在客堂里挂一幅老君或张天师的神像,道院只作为承接道场的地方。上海开埠后,外地道士随来沪移民来到上海,开设道院,为同乡服务,形成许多地方性帮派。如苏州帮、无锡帮、常熟帮、南通帮、宁波帮、绍兴帮等。见《上海宗教志》“地方帮派道士”节,第224-232页。

⑦ 浦东主要包括南汇、川沙,以及原属于上海县的三林地区。可能在顾道长眼中,三林地区因黄浦江相阻,交通极为不便,其繁华程度与浦西难以相比,故未被视作“上海城”的一部分。

里来办道院,地址就在今天的小桃园路上。有一个门面。上海人不欢喜浦东的道士,因此浦东道士都喜欢模仿上海道士,就像嘉定道士到上海来一样,都纷纷模仿我们上海道士的做法。如果道士做的道场不是上海的做法,一般东家都能够分别出来。有不少嘉定的道士就去拜陈莲生的父亲陈荣庆为先生。陈先生很愿意收徒弟,收了不少嘉定的徒弟,所以嘉定道士学到了不少城派的东西。其实,上海城派道士与外头的道士做道场时,在经和忏方面是一样的^①,法事用的书也大同小异,主要是做法不同、唱腔不同,音乐方面也是两样,比如敲的锣鼓就敲成两样的。至于做法上的不同,以做“度桥”科仪^②为例,其中有“香汤沐浴”,浦东道士是先到灵台上去念沐浴,沐浴好了之后再外面造度桥。我们上海就不对了,是直接到度桥上去超度,度桥念好结束后再一步一步念到灵台,在灵堂里去为亡人沐浴。沐浴好之后就朝参,然后我们到三宝殿,再念太一尊神、东岳大帝、丰都、十殿阎王,朝参里面的“叩见冥王”。

我做法士的时候,城派的道士加起来大概有 800 多名。城派的地方范围就是前面说过的西到漕河泾、西北到法华、南到龙华、北到闸北的范围之内。过去道士不集中,都是散居道士,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有生意了才凑在一起。很多地名到现在都变了,过去我们都叫法租界、英租界^③。我记得城派道士比较多和出名的地方有这么几个:

老城厢,现在的人民路中华路这一圈内,范围从老西门到城里,从大境庙到沈家堂。在老城厢里活动的道士大约有 50 多个人。我知道的最有名的道士是朱寿山、沈颂笙、吴安安。沈颂笙做得好,他还有几个徒弟也很出名,叫曹金宝、沈志兴、李树成(音)。曹金宝据说后来去了香港。吴安安之前也在城隍庙里。然后是陈荣庆、陈莲笙,以及我的师父沈定荣、堂姑父曹焕元,后来还有我的师兄金鸣皋。他们都是有名的大法师。

南塘浜一圈,即现在的鲁班路一带。把日晖港和龙华两处一起算上的话,那一块地方总共有 100 多个道士。鲁班路附近有名的道士有朱锡亮、朱懋清、朱竞清、朱品清,他们也是老板^④。我所说的有名气的道士,就是吹、敲、写、念样样都会,比较全面的人。这些人中有的也不是法师,因为没有拜过职,但他们也会做的。日晖港分为港东和港西,我住在港西,这边大概有四五十个道士。有名的道士有曹焕元、徐长生、陶润生,都是老板。

龙华这一块有七八个道士。有一个道士叫王殿臣,比较有名。他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还收了几个徒弟。他们人手不够,所以接了生意都要请道士,经常请日晖港的道士。

法华,包括东法华和本法华。这个地方城派的道士最多 30 个人。朱仲岩、朱毛囡两个道士在这一块地方比较有名,都是老板。

新闻,就是陈家浜那一块。那里道士也不多,接到生意时也常常要叫呼应的。这里是陈莲笙老会长的老家,嘉定和外地的很多道士都曾拜陈莲笙的父亲陈荣庆为师父。

闸北这一块人数和情况不清楚。吴关德是那边的。据说那边的道士都是从钱塘的一个镇过来的。

虹口这一块人数和情况不清楚。知名的道士有陈坤松。

江湾这一块人不多。有名的道士我记得一个叫周福康。

还有宝山、大场等地方,情况不清楚,人数都不多。

① 与其他的一些道士交谈时,对于何以经忏相似、科仪的做法却不同,他们认为是因为经书和忏经在过去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通过师徒相传的,书面的东西更容易保存一致。而科仪的具体做法因涉及音乐、动作等方面,既有地区的差异,很多时候也因不能象书面记录那样容易保留,随着一些老道长的去世,而导致许多科仪的失传、消失。

② 度桥仪,是道教中为亡人所做的一个仪式。在上海,度桥仪在一个大的道场中一般紧接在“炼度”仪之后,也有单独做的。顾道长所说的度桥仪中的“香汤沐浴”,是度桥仪中的一个环节。度桥仪中,将亡魂接引之后,主要由亡魂沐浴、朝参三尊十殿、度桥三个环节组成。顾道长以度桥中三个环节的次序的不同为例,说明不同地方的仪式展演的区别。三尊十殿,即顾道长后面提到的太一、东岳、丰都、十殿阎王。

③ 应该是公共租界。1863年9月,上海英租界和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由于公共租界主要由英国人为主导,因此上海老百姓仍习惯称其为英租界。关于上海租界的情况,可参见《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即班首。

和外来的道士比起来,上海的道士没有办道院的^①,我们都是到别人家里去做的,过去这叫作门徒制度。什么叫门徒制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归我做的,那个地方归你做的,大家对生意的范围都有一个划分和共识。过去谁是谁,住在哪里,做什么的,大家都互相知道。比如刚才说的南塘浜朱姓道士,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做道士的,所以一般不会在别人的门徒范围内接生意。依照以前的门徒制,比如说你们家有事要超度老祖宗,要请道士,你这个地方是我的门徒,但你有一个亲戚也是做道士,你如果请他来,大家就可能要吵架。一般来说,他打听这边若是有有名气的道士,他就不会接这个生意。农村和城里都有门徒制,城里的门徒情况我弄不太清楚,因为我住在郊区,不是常到城里来做。那时一个班首接到生意后,都叫自己当地的道士,人手不够了才会从外面叫人。我有时也会被叫去城里做,一般是城里的道士不够了,就会来叫我们郊区的道士去帮忙。我们村庄里都是散居道士,也是分散居住不集中的。城里面的门徒制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哪条路到哪条路归哪个道士管,这个道士就是班首,我们也称为老板。他们接到生意后,就要去找呼应道士。有些班首,一家都做道士的,人手够了,就不用外出喊呼应。而有些班首家里人少,比如我师父沈宏贵,他们一家道士不多,父子兄弟三个人,再加上几个徒弟,人手不够,就要去外面请道士。一般做一场道场,至少要八九个人以上。过去,城里面都是散居道士,没有什么庙。住在城里的这些道士都苦得很,如果没有接到生意,经济是很困难的。但我刚才说的沈颂笙就不一样,他是班首,自己有生意,钞票很多。像我们这些郊区的道士要比城里的好。怎么好呢?因为我们有副业生产。没有生意时,我们就种地、卖菜,什么都做。我们过去道士不驻庙,全在外头,不像现在的道士都待在庙里有收入的。过去庙里没有人愿意待,只有最穷的道士,穷到没有房子,只好待在庙里守庙。因为我们是散居道士,要娶妻生子的。过去农村有人生了病,家里就请两三个道士小念念,如果这家人钞票多点,就多请一些道士来做。

农村没有道院,城里才有道院。道院都开在法租界、英租界,因为那边外来人口多,各地的人都有,开店的人也多,他们对上海不熟悉。这些人生了病、家里死了人,就去道院里请道士,因此这些道院都是外帮道士办的。浦东的道士也有到上海来办道院的,上海本地道士是不办道院的。当然也曾有过特殊时期,在抗战期间,许多城里人都逃难去了,本地道士也跑到法租界、英租界去办了一些道院,这都是临时性的,怕人家不晓得。逃难时若是有人生了病、家里死了人,要请道士念经,就到道院里面去请。但本地道士和外面的道士都是各做各的,互不影响。一般来说,没事情的时候赴应道士每天都会到茶馆里去,当班首接到生意,就会到茶馆里面去找赴应道士。过去在法租界,现在叫什么路不知道,就是黄金大戏院^②那里,叫永安楼、得意楼,都是茶馆^③。租界那一块的道士都在这些茶馆里等着。过去城里的道士都是东边一个西边一个散居的,没有生意的时候也是到处乱跑,没有固定处的,所以茶馆就是班首找赴应道士的联络点。到茶馆去的道士一般都是城里面的道士,我们乡下的道士不会去的,乡下道士没有生意时还要种地。

[口述者简介] 顾冠福,正一派道士,现上海城隍庙法师。

[整理者简介] 龙飞俊,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200020

(责任编辑:段炼)

① 这与一些书中的记载不符,如《上海宗教史》第427页中就有:据统计,从1912至1932年,上海的道院或道房有74座。其中既有本帮道士开设的,也有外帮道士开设的。又如《上海宗教志》第225页:道士朱良贤、朱锡生在民国元年就在塘浜开设道院,他们的活动范围东至制造局路,西至太原路,北至建国路,南至黄浦江。应该是门徒制与道院的同时存在,但道院似乎更多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因为城市中的人流动性更强,不象农村中的人有那么强的地缘联系。

② 位于金陵中路1号。由青帮大亨黄金荣创办,于1930年1月开幕,初映电影,继演京剧。1951年3月,由华东文化部租赁,改名为华东大众剧院,为华东实验京剧团演出基地。1993年拆除。参见《卢湾区志》,745-746页。

③ 此处有误,得意楼位于金陵中路永善路口,靠近八仙桥小菜场,离黄金大戏院尚有一小段距离。永安楼不详。参见承载、吴健熙选编《老上海百业指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图。